

評介 *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柯 惠 鈴*

書 名：*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編 者：Zhao Ma

出版時地：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頁 數：xiv+366

近代中國性別與婦女研究的學術專著，極少能夠挖掘出社會底層婦女的聲音與真實生活。究其原因，首先是資料的

*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限制，底層婦女欠缺書寫能力，以致個別與集體資料皆付之闕如。其次，學界對於他者「描述」或「記錄」底層婦女的各類資料，尚未形成有力的解釋與運用方法。上述二點，一直是研究民國社會底層婦女有待突破之處。而馬釗的這本書，無論是挖掘的資料、詮釋的方式、研究範圍的設定與跨學科的努力，均可謂令人耳目一新。

馬釗是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歷史博士，本書是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改寫、修訂、增補而成。從標題來看，專門處理對日抗戰時期北平底層婦女的犯罪案件，尤其是涉及婚姻與家庭問題。作者的研究焦點頗為集中，主要環繞底層婦女的人際網絡、居住空間及其與各類犯罪行為間的關聯性。在婦女與戰爭這個主脈絡下，運用社會史的方式，拉開底層婦女身處的社會情境、人際互動與生活樣貌。作者在緒論中提到，其主要資料來自北京市檔案館度藏的刑事審判檔案中的妨害婚姻家庭犯罪案件，這個卷宗中所定義的婚姻犯罪主要有三大類，即重婚、通姦、誘拐，而作者所查閱的案卷，集中於戰爭時期的北平。¹

解讀刑事檔案中的婚姻家庭犯罪，作者並不遵循以往學界偏好的法律史角度，反而運用更多的新社會史視野。視角轉換後，案卷記錄的底層婦女的戰時日常行為就是樣貌豐富的社會史材料。專著的各個篇章逐一揭開各個不同的底層婦女，如何在艱辛而有限的社會資源中，載沉載浮，展現各顯

¹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北伐軍進抵華北，北京改稱北平。1937年，日偽政府不稱北平稱北京，但不被國民政府及市民承認。1945年日本投降，北京回復稱北平。1949年，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首都是北平，並將北平改名北京。

神通的求生本領。由於偏向社會史研究，本書提出的問題多著重於婦女的社會處境，包括面臨戰時資源日益緊縮，貧困加遽，底層婦女如何想方設法、無所不用其極地來改善自己及家庭的困境？北平底層社會的「鄰里」，對婦女的活動而言，是空間還是社會關係？民國以來，華北地區各種交通建設如鐵、公路網日趨發達，低廉的小旅館林立，這些行旅上的便利與婦女婚姻犯罪有何關聯？從案卷內容著手，作者深入底層婦女生活細節，再將各類細節放在更大的「社會史」中來理解，這是本書讀來最引人入勝之處，同時，也是過去研究犯罪案卷時未曾運用的觀點。作者自承這個研究方法，受到 Michel de Certeau「日常生活策略」論點的啓發。底層婦女的日常生活，絕非稀鬆平常、日復一日，她們與他人的接觸、談話、勞動操作都可能是觸發各式各樣轉變的根源。本書從社會史出發，還提供了許多豐富的研究角度，包括北平底層社會的職業型態、經濟收入、人際網絡、階級意識、地域認同、婚配方式、兩性關係、家庭倫理等等。無論就近代中國婦女史、戰爭與社會、或是社會史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本書成果實令人矚目。

在馬釗饒富野心與創意的著作中，有些縫隙留下了幾個未解的疑問。1937年7月底，北平淪於日僞統治，政治動盪、經濟蕭條、物資短缺，一般人的生存與生活變得更加艱辛，城市的底層婦女面對戰爭的艱困逼迫，自有其各種複雜多樣的生存策略。本書大部分內容都是利用犯罪案卷所提供的口供內容，來呈現底層婦女或精明、或投機、或鑽隙、或順應、或聽命的各種遭遇。刑事檔案資料自有其重要價值，而案卷內容的紀錄自然牽涉到許多複雜的解讀方式。作者的分析角

度，著重於案卷釋放出的社會訊息，對於其他有關戰爭時期，北平日偽政府司法權、警察權的設計與權限等同樣依附於案卷檔案上的訊息，則較為忽略。另外，研究底層婦女的口供，必須留意婦女與國家機器對話時，爲了替自己開罪，往往不免配合說出一些對方想聽的話語，這是研究者面對口供時，一個不能不考慮的文本挑戰，然而作者對此，似乎並未著墨。

本書集中處理北平底層婦女，她們的聲音大量出現，突破過去戰爭與社會的研究中，一直聽不到、看不到底層婦女身影的瓶頸。不過，就因爲太倚重案卷，太集中關注底層婦女，反而忽略國家上層的權力運作與社會管理，至少在案卷文本研究中上層與下層未被聯結，它是作者書中的兩條敘述主線，彼此鮮有交集。上層日偽政府或是北平的社會菁英，至少是透過警察與司法來貫徹他們對於底層婦女婚姻的規範。審判最終的判決書或是報紙上的輿論與婦女口供之間，是否有所差異？上層與下層間往覆來去的拉扯，呈現出來的戰爭時期女性性道德，是比戰前鬆動還是更加嚴格？若能將政治、戰爭角度帶進案卷內容的解讀，或許能夠說出更多底層婦女的「戰爭故事」，而不是令人聽來意猶未盡的戰爭中北平婦女的犯罪故事。

就內容而言，本書以社會史的角度討論前人未曾觸及的底層婦女問題，此正是本書最精采之處。馬釗以三大編六個篇章，呈現北平底層婦女群體內外在處境。第一編著重探討北平底層婦女工作就業的情況，作者先描述北平政治、經濟、地理的位置，進而指出其經濟型態爲商業重於工業，影響所及，婦女多從事「服務」導向的工作，如縫補、女傭、

女招待、娼妓等，這些工作的特性是臨時、短暫，救急而非救窮，甚至不被當權者承認為「職業」。工作機會短缺，收入不豐使底層婦女難以擺脫經濟上的弱勢，致使她們具有濃厚且根深柢固的「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婚姻觀，男性被視為家庭的依靠，男尊女卑是主流的家庭權力結構。不過，底層婦女也利用這種觀念來合理化自身的行為，既然男性是家庭的衣食支柱，一旦男人在養家活口上捉襟見肘，婦女便抱著另適他人的態度，進而付諸行動者，極為普遍。

第二編著重探討鄰戶空間與婦女生活的關係。北平的底層社會，多是從郊區農村流入城市的農民，他們在市區落腳後，比鄰而居的交情甚至超過原來農村的血緣聚落。貧民區內破瓦爛屋櫛比鱗次，家家戶戶聲氣相通，鄰居間既在生活上相互支援，也在大小諸事上相互參與與監視。在這樣複雜的居住環境裡，女性顯然比男性更如魚得水。她們慣於隨機應變、沒有目的，不時與他人交換祕密，也容易真情流露。不可否認，婦女的確更能適應、操作，甚至悠遊於底層的居住空間與人際網絡。底層婦女的婚姻、家庭事件，往往不免牽扯眾多的街坊鄰里，鄰里包圍著底層婦女，底層婦女又是鄰里的一員，婚姻犯罪就如同底層社會的縮影，如一位貧婦想逃家另嫁，這個念頭被鄰戶得知，有門路的為賺取媒合的費用，不惜欺騙男方女方已婚的事實，又或者乾脆替男女兩方擔任證婚人，這些情節說出底層婦女既是弱者、也是強者的複雜面相。底層社會自行其是，成了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化外世界」。什麼文明婚姻、家庭平等種種改革理想，實與底層社會各自並行。

第三編討論近代華北現代化的交通建設，鐵路與公路的

擴建打破了省際、地理的空間邊界，婦女逃家變得更為容易。民國時期旅館業的蓬勃發展也有利於婦女出逃，她們毋需擔心吃住問題，或是露宿街頭。利用遷移的便利性，婦女也加入投機倒把的行列，藉著偽裝行旅進行犯罪或地下經濟活動，日本統治者基於情報與治安的考量，對旅行遷移者實施監察與控制，婦女則與這些制度周旋較量。1940 年代北平日偽的戰爭措施，作者將視角移到共產黨 1950 年後的城市改革時，獲得了城市治理歷史經驗的新意義。制度轉移與流變，不論是消失、重現或移植都值得深入細究。作者最終說到，共產黨政權掌控下的北京，底層社會真正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有關城市底層婦女具有的共同生活經驗，作者在書中有提綱挈領的說明。首先，底層婦女的經濟處境與社會空間具有「城市邊緣性」，邊緣化的社會地位使得底層婦女占據鄰里，鄰里不只是空間也是人際關係，她們在鄰里間，接收同時產生各式各樣的日常「知識」。底層婦女的「城市邊緣性」反映在人際關係的建立上，不像男性依據職業、同鄉或政治認同而加入團體，婦女交往多半出於情感或經濟上的需要，深入來往一般是偶然的、散漫的，並且難以納入政治動員的。戰爭時期，北平底層婦女仍然固守傳統價值與觀念，最顯著的是家庭經濟方面，男性是一家之主，必須養家活口，一旦妻兒不能溫飽，生活陷入絕境，底層婦女往往另尋出路，或與人私奔，或離家出走、改名另嫁，均稀鬆平常。北平底層婦女的婚姻觀，與上層菁英觀點天差地遠，菁英的婚姻改革理想係從法律著手，目標是社會向文明前進，國家、法制、革命、改革本質上是「男性化的」（或說是雄性化的）

觀點。底層社會則是生活導向的，充斥著隨機應變、混口飯吃的行爲，小本生意與販夫走卒充斥，助長錙銖必較、尖酸刻薄、僵化落伍的傳統觀念與習俗，鄰里間說長道短與走家串戶爲混亂的男女關係、逃家另嫁及販賣人口大開方便之門。底層社會「女性化」（或說是陰性化）生活特徵顯著，而此一「女性化」社會的生活主角不折不扣正是「婦女」。

「性別」是作者解讀北京婚姻犯罪案件的重要線索。戰爭造成政治社會鉅變，北平城市的整體居住條件有別於戰前，不禁讓人思考：底層婦女生存掙扎與男性有何不同？不同階級婦女，各自的戰爭經驗有無差異？貧窮、困頓家計與養兒育兒煎熬，始終是底層婦女的生活現實，這是一個跨越歷史時代的共同婦女宿命。戰爭時期的日偽統治，情況有什麼具體改變？日本統治，在北平展開戰爭宣傳、民眾動員以及資源控制與配給，「鬼子」、「敵人」有否勾引出底層婦女的「國仇家恨」？因而在精神上、生活上更加奮進而忍飢挨餓？至少這是許多抗戰史書寫的主軸，本書似乎沒有試圖和這樣的抗戰史書寫觀點對話，有些令人惋惜。將焦點對準底層婦女而非更多層次的性別分析觀點，架構了作者提問的方式。「底層婦女」在作者研究佈局中，被看作一類社會群體，她們與菁英男女、底層男性有著明顯區隔。差異性成爲預設的立場，以致缺乏考慮戰爭情境中，作爲「中國人」可能出現的同仇敵愾情緒。或許，資料中難以呈現民族主義與底層婦女間的聯結，但作爲抗戰史目前研究成果的一個突破，或許這種對話仍是必須。

瞭解北平底層社會樣貌，不能脫離特定城市的特定空間。本書作者已注意到社會分層的住居環境，及其所產生的

社會互動。不過社會空間為男女共有，當北平於二十世紀初接受了大量由周邊農村流入城市的勞動人口，其中有男有女，在那些隨意搭起的棚屋與簡易民房所形成的貧民區，男人白天出門工作，婦女幾乎日夜不踏出此一區域。她們或在家做手工藝，或無所事事地走街串巷，在說長道短中建立親密感。底層的違法事件層出不窮，如綁票、誘拐、騙賣、逼良為娼、賣淫、通姦等等。在這些事情中，很難相信男人完全置身事外。生計逼迫、人際網絡、生活環境不只決定底層婦女的行為與道德，放在底層男性身上，同樣一體適用。若書中能夠運用性別分析，加入底層男性的描述，將使論述更加完整與有說服力。

本書的研究的確為戰爭時期，城市婦女日常生活研究開展出新的視野，作者不僅運用了過去研究民國婦女史較少注意的刑事檔案，同時，作者還利用新社會史的方法，為檔案材料注入不同於黃宗智等學者由法律史出發的研究觀點，這些都是本書難能可貴的學術貢獻。不過，在作者抽絲剝繭的研究架構中，仍浮顯出一些還可以再加思索的問題。

首先，由於作者將戰爭時期涉及婚姻家庭犯罪的檔案，作為社會史資料來解讀，固然其中可以耙梳出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情境，不過卻不易與「戰爭」、「戰時城市社會」等問題緊扣。儘管作者在書中提及相關時代的背景，例如：日本在北平進行物資管控以補給軍需，北平戰時物價不斷上揚，以及為了維持治安保防，制定了嚴格的出入登記與戶口調查辦法等等，這都是作者賦與的外部說明。綜觀全書，作者所舉的刑事案件，婦女似乎極少親口描述對於戰爭或戰時北平城市變化的感受，作者所強調底層婦女的「生存策略」，

雖發生在戰時的北平，卻似乎又讓人感覺可以抽離歷史時空，成爲民國以來底層婦女生活同一樣貌的論證。法律案件讓作者得以揭開底層婦女生活的細節與種種里弄巷底之事，可是專注於「微觀」，就有可能與特定的歷史時間、空間難以緊扣。如果本書能先以宏觀的方式提供日僞統治北平時期的社會控制、經濟物資管制、警察權及司法中民法處置的基本梗概，將更能說明作者所呈現的戰爭中北平底層婦女的犯罪問題。換言之，刑事檔案如果只以社會史的角度來呈現，可能會削弱其中的「戰爭訊息」，如能同時考慮法律、文化、政治、戰爭的歷史事實，或許更能突顯戰時北平與非戰時期北平底層婦女生存策略的差異。

舉例而言，作者書中描述了一件李楊氏背夫與情人私奔的案例，兩人因最後被警察逮到，丈夫遂到法院控告妻子與情夫通姦。這個案件中除口供外，最令人好奇的莫過於北平日僞警察的功能與定位。一對男女，順利通過北平前門東站的檢查哨坐上火車，卻在北平郊外通縣的小旅館中被警察逮捕。警察憑藉什麼理由逮捕這對看起來有如夫妻的男女？這個情節牽涉到戰爭時期北平日僞的戶籍管理，以及警察的工作內容，戰爭時期查緝顛覆分子比取締風化來得重要，這對男女因防奸治安碰巧被抓，最後卻成爲背夫私逃的通姦案。由案件文本牽連出的戰爭社會情境、政權統治與法律執行，這部分的聯結本書稍嫌薄弱。

最後，作者研究的主題是底層婦女，本書的撰寫也深入描述了北平底層婦女的諸多生活方式，其間作者運用了性別角度來分析、闡述其所提出的各種設定。不過，讀完本書後，仍有一個疑問，底層男性與底層女性在生存策略方面，究竟

有多少差異？撇開性別不論，階級或許是城市生活中的另外一種重要區劃，換言之，菁英女性與底層婦女雖然同屬女性，但彼此間的差異可能大過底層婦女與底層男性的差異，底層社會的男女可能均十分依賴鄰里間的社會網絡，男性亦逃不過鄰里的搬弄與訛議，他們的婚姻、名譽均受到鄰里的威脅，鄰里也同樣提供男性生活上的救急紓難與情感上的慰藉。許多作者所舉的案件，男性與女性的遭遇似乎是同一故事的兩面，作者只書寫底層婦女的生存策略，視男性於無物，讀來難免令人心生疑問。

本書在結論中將論點拉長至 1950 年代，指出共產黨對城市生活的改造，造成底層婦女長久固守生活的衝擊，這一結論十分具有啟發性，與前述篇章所書寫的戰時北平底層婦女作對照，結論把觀察底層婦女生活延長至 1950 年代左右，並指出過去研究城市與性別時，因多集中於特定時期，以致歷史轉折的意義不易突顯。惟作者的研究斷限在標題上是止於 1949 年，此時的「北京」實應稱為「北平」才更符合歷史事實。戰爭與社會這個歷史圖景，尚待大量研究來拚出清晰的樣貌，馬釗這本著作開啓戰爭中特定區域、特別階層的研究視野，從方法論、研究主題及成果上來看，都為戰爭與社會開發了新資料，同時更重要的是，把婦女放在戰爭中來觀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書評人深深地被作者自序中的一句話所觸動，那就是史家 Laura Thatcher Ulrich 所講的：「中規中矩的女人很難創造歷史」(Well-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這真是看待婦女與戰爭非常有趣的思考點。